

学林

◀ (上接3版)

学林出版社出版。李玲璞先生在字典的序文中对至今未有异体字研究专著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自许慎（约58—约147）开创选收重文的体例以来，代有增补，或就某一书体，或依某一时代，而时至今日，尚无全面收录古今汉字异体的专书问世。这并非学人疏于此道，而是由于编纂此书确有困难：一是汉字古今纵贯，源远流长，地域广阔，异构繁多，难扼其要领。二是古文字文献虽已大量出土，但尚未及一一依类成断代专书，全面的材料难以蒐求。三是通假字、古今字的烦扰，或如影随形，或藕断丝连，难以范围。事实表明，不破三题，则无望成书。有鉴于此，我们便于1987年着手这部字典的材料蒐集工作，历时八年，始成此编。”这也充分证明了顾先生所言“我颇感异体字问题很有研究”中所包含的深刻寓意。

“熊夫人已95，我亦93了，很想看到出书”

1995年12月4日，顾先生在给吴建中（时任上海图书馆副馆长，2002年任上海图书馆馆长——作者注）和我的来信中详细讨论了《熊希龄先生遗稿》出版事宜。当时正值《明志阁遗著》一册（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之际，顾先生为遗稿题写了书名。但《明志阁遗稿》仅是熊希龄先生（1870—1937）遗稿的一部分。顾先生在来信中引用了1995年11月28日台湾熊夫人[毛彦文（1898—1999）女士]给顾先生来信中所述：“彦早已决定俟第一批遗著出版后，即继续出版第二、三批，将全部遗著出版，以了心愿，不悉此愿能完成否？”顾先生在信函中也写道：“熊夫人已95，我亦93了，很想看到出书。”两位世纪老人关于熊集出版的急迫心情溢于言表。《熊希龄先生遗稿》五册后由上海书店出版社于1998年12月出版。

顾先生在来信中提出了关于《熊希龄先生遗稿》出版的几点希望：“我有几点希望，供参考：熊希龄先生是清末民初的政治人物，应以政事为重。至于他亦擅书画诗词，则其余事。不要本末倒置。于为刚（上海图书馆古籍部研究人员，当时已退休——作者注）同志的编次，当时根据叶景葵（1874—1949）的分类，书名亦叶氏所定。我们又参考了清末名人的政书而编定的，切勿重起炉灶，重新改编。

重新改编，不但几年辛苦白费，而且可能弄得不伦不类。我们急于看书，改编等不及了。于为刚的抄本，不能直接交厂出排印。要以复印件发排，否则排样出来底本面目全非了。我想全集一起印为好，不要零敲碎打。”顾先生在信中还提到了已排印出版的《明志阁遗著》，“印好后，勿再继续印下去，快快煞车，等研究好了再说”。顾先生信中所说关于《熊希龄先生遗稿》出版的几点希望，对于历史文献整理具有重要的价值和启示。

首先是历史人物文集编纂的原则。熊希龄作为清末民初的政治人物，其文集的编纂应以政事为主。熊希龄亦擅书画诗词，则其余事。顾先生在1994年9月为遗稿所写序文中提到了熊希龄遗稿的文献价值：“熊先生遗稿，余曾略窥一二。所存稿件，都出亲自属草，以振兴实业为怀，精心擘划，爱国热情，溢于言表，良可钦佩！明志阁者为先生书斋之名，常见其书笺、文格均刻之，微见先生淡泊明志之意也。”因此，《熊希龄先生遗稿》在编纂时充分体现了熊希龄作为政治人物以

政事为主的编纂宗旨，将其诗存、词存列于第五册的后面，没有出现顾先生在信中所指出的“不要本末倒置”的情况。

第二是文集分类切勿重起炉灶。顾先生在信中反复指出，文集分类“切勿重起炉灶，重新改编”，《熊希龄先生遗稿》的内容编次曾根据叶景葵的分类，书名亦叶氏所定，同时还参考了清末名人的政书。根据顾先生的意见，《熊希龄先生遗稿》出版时分为五大册，前四册均为电稿，第五册为函稿、杂著、佚文、诗存、词存，体现了以“政事为主”的编纂旨意。

第三是全集一起印为好，不要零敲碎打。顾先生对1995年12月已出版的《明志阁遗著》并不满意，指出“全集一起印为好，不要零敲碎打”，以免“弄得不伦不类”。《明志阁遗著》收录了熊希龄先生的部分政文，有“零敲碎打”之缺。故顾先生在信函中指出，对已排印出版的《明志阁遗著》，“印好后，勿再继续印下去，快快煞车，等研究好了再说”。于为刚先生作为编者在《熊希龄先生遗稿》的编辑说明中交代：“熊



1993年，顾廷龙先生与作者在淮海中路吴兴路寓所门前合影。

先生的文章、序跋、奏摺、呈移文稿，先已编入‘文存’，以《明志阁遗著》书名出版，作为全书第一册。但付印时，体例有所变动，难以赓续。现在出版各册，实即《明志阁遗著》的续集。其中‘佚文’为‘文存’中删落各篇。”于为刚先生在后记中又写道：“这部书用了几年的功夫，到今天总算出齐全了。其间多有曲折，总共五册书（实际当为六册书——作者注），却有两个书名：《明志阁遗著》和《熊希龄先生遗稿》。排印的形式也有两种，但读者使用时，应当看作是一种书。”这是当年整理文集时不得已的情况，而这也是整理历史人物文集时有出现的不足，为后人整理文集提供了经验教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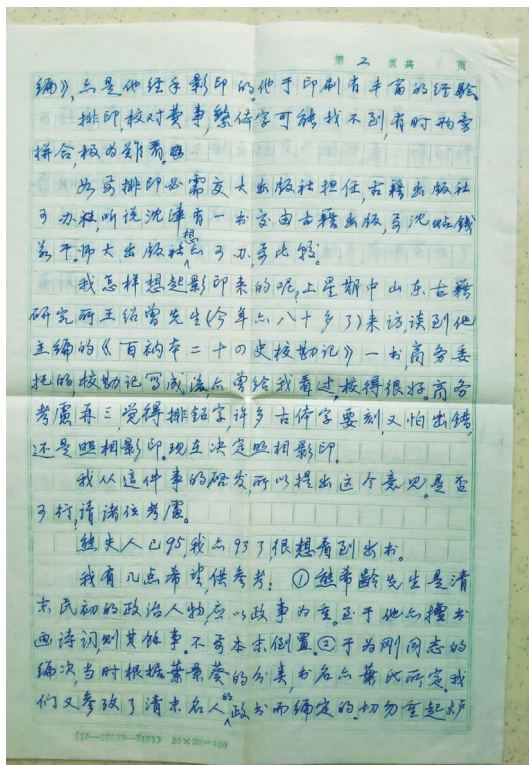
《熊希龄先生遗稿》1998年12月出版，毛彦文先生曾在1996年9月即写就了《熊希龄先生遗稿序》，内中记述了遗稿出版前的有关情况：“秉三（指熊希龄——作者注）这部《遗稿》得以出版，经过了许多困难与曲折。当年北方有战事，秉三公有一批在民国初年执政时的文件及手稿，恐在战乱中散失，因此批稿件具有资料价值，可为研究历史者参考，故装成几木箱，由北平运至天津法租办小孟庄家中存放。1940年华北大水灾，秉三公至交叶揆初先生恐遗稿被水泡坏，急着人至天津，将它们全部运至上海他主办的合众图书馆存放。翌年我由桂林回沪（抗战时，我在桂林五年办慈幼分院），去见叶公，他告我遗稿运沪事，并邀我去合众图书馆视察，同时介绍我与该馆总干事顾廷龙君相见。当时叶公告我，他准备将此批遗稿整理编辑成书。不幸叶公于1949年春去世，夙愿未遂。其后两岸相隔，音讯不通。直到1983年取得联络，方知合众图书馆等四馆合并为上海图书馆，由顾君任馆长。得悉遗稿无恙，于是我决心筹款将遗稿

全部出版。承顾君同意，指派几位馆员开始整理，由于为刚君负责。此工作繁重而枯燥，于君锲而不舍，工作十多年，终于在全部完成。我对顾君、于君及当年参与工作的诸君，暨去年接办此事的王世伟君表示衷心的感谢。”

照相影印为古籍整理之良法

顾先生关于《熊希龄先生遗稿》的来信中还谈到了古籍整理中的照相影印，认为这是古籍整理的有效方法。顾先生来信中指出：“我考虑了几天，有一个办法，即根据于为刚同志抄本付之影印。如用大开本分上下两栏，即仿《续四库全书》的格式。……排印、校对费事，繁体字可能找不到，有时两旁拼合，极为难看。”顾先生之所以提出影印的整理方法，也是由于山东王绍曾先生（1910—2007）到访的缘故。顾先生在信中提到：“我怎样想起影印来的呢？上星期中山东古籍研究所（指山东大学古籍研究所——作者注）王绍曾先生（今年亦80多了）来访，谈到他主编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一书，商务委托的，校勘记写成后，亦曾给我看过，校得很好。商务考虑再三，觉得排铅字，许多古体字要刻，又怕出错，还是照相影印。现在决定照相影印。我从这件事的启发，所以提出这个意见。是否可行？请诸位考虑。”尽管后来《熊希龄先生遗稿》从文稿整理的实际情况和方便读者的角度还是采用了排印标点出版，但顾先生这里所提出的古籍整理的照相影印方法，不啻是古籍整理的良法之一，这种方法不仅可以避免许多整理中可能出现的一些错误，还能提高整理的效率。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信息研究所研究员）



顾廷龙先生1995年12月4日写给吴建中和作者的信。



1995年和1998年先后出版的《明志阁遗著》与《熊希龄先生遗稿》